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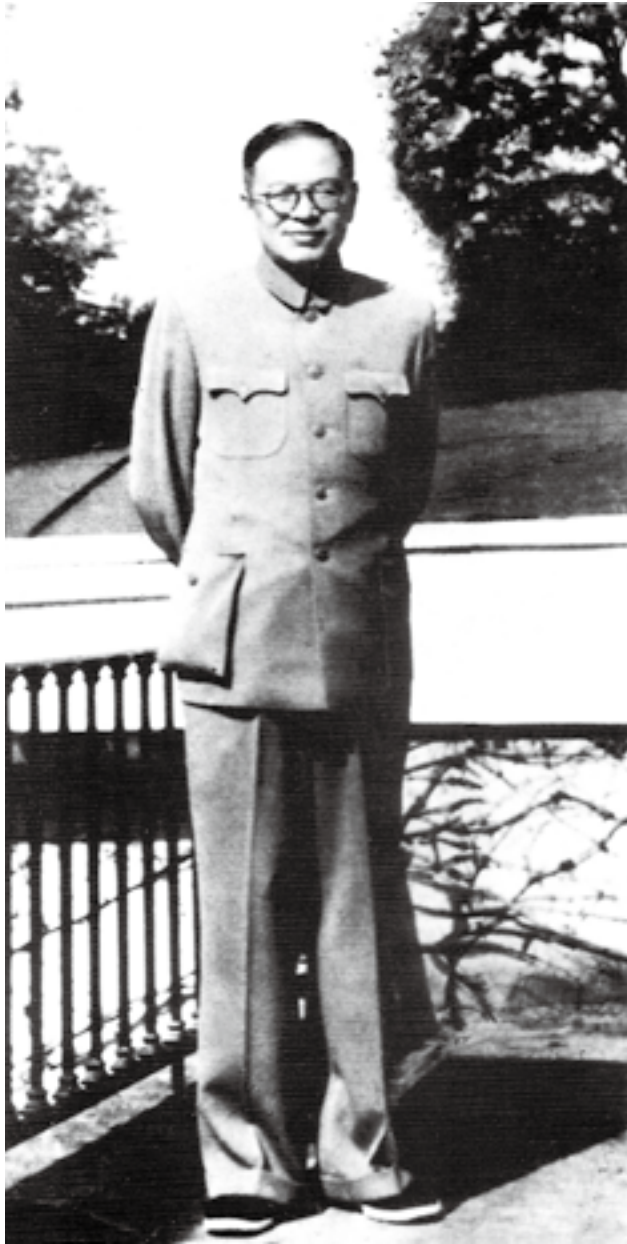


# 張聞天 與中國外交

蕭揚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外交家張聞天。



1951年7月1日同來駐蘇使館的林伯渠（左六）、陳昌浩（左三）等人合影。



1937年政治局十二月會議（張聞天是會議的主持者）。前排左起：項英、凱豐、王明、陳雲、劉少奇。後排左起：康生、彭德懷、張聞天、張國燾、林伯渠、秦邦憲、周恩來、毛澤東。



1972 年，已在新疆建設兵團勞動 10 年的兒子虹生（前排右）攜孫女冬燕（前排左）到廣東肇慶看望父母。後排右一是劉英的姪女劉海燕。



與妻子劉英最後一張合影（1976年春攝於無錫鼈頭渚）。

# 目 錄

開頭的話	17
代緒言：外交不搞世界革命	23
一、走上外交崗位	41
從未到任的常駐聯合國代表	42
資望有餘，授權有限	45
個人志趣服從調令	50
二、整裝待發的駐聯合國代表團	55
朝鮮戰爭：如何對待參戰、談判和停戰	56
聯合國：爭取加入還是鬧成僵局？	60
早日同西方國家建交，還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62
三、在駐蘇聯大使館	69
服務國內建設——駐蘇聯大使的工作主軸	70
駐外使館的工作重心不是交際應酬	74
中蘇經濟合作談判的前線總指揮	80
“答覆請示制度”	87
信賴蘇聯外援，質疑蘇聯模式	88
狹隘民族主義的堅定批評者	93
涉及反對個人迷信的兩件事	99
參加日內瓦會議	104

生氣勃勃的調研工作	108
那一段令人懷念的日子	113
舊豪宅裡的尚儉之風	119
四、在外交部：外交政策思想	127
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	128
“新的世界戰爭有可能避免”	131
和平共處 VS 世界革命	136
溫和，理性，開放和國際合作	144
和平共處實踐的成功總結	148
新的理論概括——關於民族主義國家之一	151
對印度尼西亞的觀察——關於民族主義國家之二	158
爭取長期和平共處不動搖——關於民族主義國家之三	162
在中蘇裂痕初現時——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一	166
批評大國主義和驕傲情緒——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二	169
既要團結合作，更要獨立自主——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三	175
如何認識和對待南斯拉夫——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四	180
對美國：鬥爭中也要謀求緩和——關於西方國家之一	185
如何認識英美矛盾的兩次爭論——關於西方國家之二	188
對特殊中間地帶的分析——關於西方國家之三	192
外交觀：外交中的政治和技術	195



五、在外交部：內部工作	205
“改進”內部工作	206
與同志們相處	207
外交領域的理論研究	213
總的口號：努力提高業務水平	219
主持肅反：糾“左”	224
“掛帥”反右：保護右派	227
加強對駐外使館的領導和幫助	235
艱難的禮賓改革	238
節約和清廉	243
最討厭的是利用特權為親屬謀利	250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開拓者	257
用世界眼光研究外部世界	258
筆路藍縷，以啟山林	261
研究工作的內行領導者	265
抵禦運動“左”的衝擊	270
結尾的話	277
後記	285

## 開頭的話

張聞天，這個歷史上長期蒙垢的人物，經過 1979 年平反後 30 年中許多人的共同努力，其本來面貌逐漸得到恢復。人們知道他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並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知道他在總書記任內領導實現了黨從內戰到抗日戰爭的戰略轉變，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知道他堅持真理，在廬山會議上直言蒙冤，在“文革”流放的艱難條件下撰文批判“左”傾路線。一位為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領導人的真實形象在人們心目中重新顯現：具有開闊的世界眼光和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正確決策；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善於團結幹部，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敢於擔當，無論處於順境還是逆境，不驕不餒，始終為人民的利益辦實事，講實話。

但是，並不是張聞天的所有業績都已經為人們了解或認同。例如，對於他在外交崗位上的作為，許多人就不甚了了。其實，他在外交崗位上工作了 10 年（準確地說，是 9 年 6 個月又 27 天<sup>〔1〕</sup>）。這 10 年佔他一生的七分之一強，佔他從入黨到逝世的全部革命生涯 51 年的近五分之一，比起他所曾從事的其他工作來（無論是黨中央總書記，還是中央宣傳教育部門的領導工作、東北的地方領導工作，甚或廬山會議後的經濟研究所研究工作），時間都要長，只比他“文革”被鬥被流放的 10 年又一個月略短一些。只是在這 10 年中，張聞天所擔任的是未曾到任的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授權有限的駐蘇聯大使，

以及外交政策執行機關外交部的常務副部長。由於工作的性質以及中央的有限授權，張聞天所能發揮的作用有限，他在外交崗位上對全局的影響，顯然不如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那些年。儘管如此，他在外交崗位上的10年仍是卓有建樹的10年，可資記述和應該記述的10年。他的外交政策建議和推行正確的外交政策的努力，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機關的組織建設、業務建設所做的貢獻，他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的奠基性業績，以及他在外交工作中展現的風格，都使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上一個不能也不應避開的人物。

在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的10年中，我有9年在他領導下或直接在他身邊工作。

1951年張聞天出任駐蘇聯大使，我那時任職的駐阿拉木圖總領事館即歸他領導。他的領導不是一般大首長式的原則領導，更不是甩手掌櫃式的等於沒有領導的領導。他曾親臨遠離莫斯科數千公里的阿拉木圖，住在領館現場考察了一個星期。他沒有要我們做正兒八經的彙報，但是平日接觸中向我們提了許多關於當地情況的問題，其中不少是我們沒有留意或知之不詳的。結束考察之前他同領館全體同志談話，要求我們把主要精力轉移到對當地情況的調查研究上來。在他來領館以前，我曾就蘇聯當時對哈薩克19世紀同俄國關係問題進行的思想批判整理過一個材料，由領館報送使館。那時沒有電腦，領館也沒有打字員，材料複寫了25頁，用紙很薄，字跡也不清晰。張聞天居然仔細看了，畫了許多槓槓、鈎鈎。還做了批語，號召大家注意和研究蘇聯的動態，還給領館發來電報，表揚這份材料。這次在領館，他又對我說，這類材料有啟發，類似工作還要繼續做。

1953年11月，駐阿拉木圖總領事館因為業務量太少而撤銷，我奉調莫斯科駐蘇使館，從此在張聞天直接領導的單位裡工作和生活，也同他有了更多接觸。使館的空氣緊張而熱烈。快節奏的工作和學習，充實的生活，大家的情緒高昂而舒暢。張聞天在參加日內瓦會議等重大外交活動和處理日常對外工作的

同時，對使館的內部工作也抓得很緊。他同我們一起參加學習討論會，一起打球跳舞，一起散步聊天，定期向全館同志佈置總結工作。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題目的確定和研究報告的撰寫都由研究室主任何方指導，但是每一篇報告都由他修改審定。我同大家一樣，在使館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處不看到他的身影。我們大家都感到他是我們中的一員，團結我們、帶領我們前進的一員。

1955年1月，張聞天回國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從這時起，我當了他的秘書。白天，我坐在他的辦公室裡。晚上，住在他的中院裡。星期天，他常約外交部一些單位的負責人一同散步閒聊，我常隨行。他主持的各種會議，常由我做記錄。部內外各單位送他審批或傳閱的文電，一般我先過一下手，對一些略欠成熟的文稿盡我所能做些拾遺補闕的工作。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聯繫，也是我的經常任務。他到外地視察或開會，我也常隨行。但是，像幫助起草或修改重要文稿一類高一級的秘書工作，則主要是由何方擔負的。何方雖然職務先後是外交部辦公廳的專員和副主任，卻做了許多張聞天秘書性質的工作，堪稱張聞天的得力助手。儘管如此，那些年我確實在張聞天“身邊”工作，接觸到他待人處事的方方面面，了解他的思維習慣和方式，受到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風的感染，而且對他自然而然地懷有一種崇敬而親近的感情。

但是，應該說在這段時間裡，我對張聞天的了解是非常不夠的。單說張聞天的歷史，我幾乎就毫無所知。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連他在遵義會議上同毛澤東站在一條戰線、曾任黨的總書記，我都是到了1959年的批判會上才得知的。至於他在遵義會議上做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起草會議決議等等，我一直到1979年中央為他舉行的追悼會上才從鄧小平的悼詞中聽說。張聞天從來不說自己的光榮歷史。由於長期以來他的形象被醜化，事跡被淹沒，許多人也不清楚這些歷史，即使有所知，也不會向我宣揚。我則同那時許多年輕同志一樣，只是單純地工作，沒有打聽他人身世和人際關係甚或進一步營造人脈的習慣和興趣。



1959年4月參加華沙條約締約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會議期間在華沙參觀，26日攝。左起：蕭揚、方祖安、王國權、張聞天。右二徐達深。張聞天和我一同出現在畫面上的照片，經過“文革”浩劫已蕩然無存。這是僅存的一張，駐波蘭大使館從波蘭方面徵集的照片中偶然得來。

1959年的廬山會議，我隨張聞天上了山，親身感受了這場突然襲來的風暴，目睹了張聞天被拋進萬丈深淵的殘酷過程。我的同情完全在張聞天一邊。在他經受鬥爭煎熬的漫長日子裡，我只希望這一幕快些過去，希望他能快些安全過關。幾乎完全出於我的主動，我幫他起草了一份檢討，即他在廬山的第一份檢討。這份檢討的基調是承認對大躍進中的缺點估計過重。這樣寫固然主要是順著來，卻也反映我的個人迷信仍深，相信在看待大躍進的問題上確實存在當時批判者所說的立場觀點方法問題。

廬山會議以後，全國外事會議和外交部接連開會，繼續批判張聞天。我無

權參加外事會議，但是在外交部的批判會上卻被要求揭發交代。我思想上並不認為張聞天、劉英夫婦反黨，感情上更不願同他們破裂。但是，在以黨的權威和革命的真理的名義進行的“教育”下，我相信自己需要改造，強令自己“端正立場”，改變認識，將張聞天許多正確、正當、正常的言行硬往反黨的路線拉。我的“揭發批判”長期以來一直是我的沉重包袱。1985年我在《憶廬山會議前後的張聞天同志》一文的最後，寫下了久已鬱結於胸的一句：“在二十年的長時間中，我曾對許多事實做過多次完全顛倒了性質的批判。這使我至今仍深感負疚。”

更加令我愧疚的是我的離開張聞天。張聞天本來希望我繼續留在他身邊，我卻要求離開他，留在外交部。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為個人前途打算的私心。張聞天曾針對運動中一些表示劃清界限的同志說，現在船要沉了，都要溜了。這話也勾畫出了我的靈魂。我向張聞天提了幾次，內心也反覆掙扎，最後還是在外交部領導的支持下沒有等到張聞天同意，就交出我管理的文件櫃的鑰匙離開了。這使張聞天極度傷心和憤怒，他用從未有過的大嗓門怒吼：這是欺負人！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我還是外交部。不論如何，我在他落難時節離他而去，加劇他的創痛，這始終是我感到最為愧對張聞天的心頭之痛。關於我之調離張聞天秘書的崗位，還聽到一種說法：張聞天要求外交部令我繼續做他的秘書，外交部則認為我是“張聞天的人”，必須調開，只同意另派秘書去。情況是否確實如此，自然無須再加深究。不論如何，就我而言，離開他是我主動要求的，我一直深深負疚。1980年我在《補獻的花圈》一文中表達了這種感情，也許是因為懺悔不夠徹底，沒有引起出版社編輯的重視而被刪去。

此後經過20年，張聞天在毛澤東去世後獲得平反。中央決定出版張聞天文集、傳記，我有幸參加編輯工作，在領導小組的領導之下主持負責日常編務的工作小組。在三年半的時間裡，我同小組裡的張培森、程中原、施松寒等同志一起，埋頭於張聞天的史料，閱讀他的著作。我彷彿重溫了在他身邊的日

子，卻又不斷發現我不曾知曉的他的業績、品德的閃亮點。1985年《張聞天文集》出版以後，我不再擔任編輯工作小組長，卻一直沒有脫離張聞天的研究和宣傳事業。我參加了後來陸續出版的張聞天年譜、畫冊的一些工作，為此查看了有關檔案材料。我關注國內張聞天研究的進展，並且不斷從許多同志的研究成果中獲得教益。1979年以來這30年的工作以及工作中的再學習、再思考，使我一步復一步，日益走近張聞天。當年我在他身邊如沐春風，直接的所見所聞讓我感知了一個鮮活的張聞天。現在我進一步懂得了這個鮮活人物背後的歷史和背景——他走過的光彩奪目而又跌宕起伏的歷史，他生活和工作的國內國際、黨內黨外錯綜複雜的背景，以及諸如此類許多單憑直接接觸還無法了解的事情。不僅在當年我完全不了解的歷史時期如此，就是在我日夜相隨的他的外交工作時期也是如此。我看到，他在外交上確有許多清醒的獨立見解（我過去所看到的他在行動上執行中央政策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這是十分可貴的。當然，他也有那個時代共有的局限。基於這種新的認識，我對他有了更深更理性的尊敬。

在這本書裡，我就想談談張聞天外交生涯中的一些事，當然是基於我個人的接觸和感受，基於我現在的認識。

## 註釋

---

- 〔1〕 張聞天的外交生涯，起於1950年1月19日周恩來外長照會聯合國大會主席羅慕洛、聯合國秘書長賴伊，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業已任命張聞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會議和參加聯合國工作包括安全理事會的會議及其工作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訖於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決議，宣佈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崗位。

## 代緒言

# 外交不搞世界革命

1959年張聞天因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挨批期間，我曾聽他說，毛澤東在某次會上問了一句：在國內問題上右傾，在對外問題上怎麼樣呀？也許就是因為這句話，廬山會議以後的外事會議和外交部的批判會上，張聞天的“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成了批判重點之一。陳毅1959年9月12日在外事會議的總結發言中說，廬山會議以後很明顯地看出，外交政策上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和做法，另一條是以張聞天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外交政策路線和做法。此後外交部的批判會上反覆說：張聞天只要和平共處，不搞世界革命；張聞天的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同毛主席以實現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為戰略目標的外交路線根本對立。

人們常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建國以來一以貫之的。其實，只要正視歷史就不難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後兩個30年的外交路線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前30年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同後30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截然不同一樣。後30年中國執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前30年佔主導地位的則是革命外交路線。



所謂佔主導地位，是說還有一條不佔主導地位的和平外交路線<sup>〔1〕</sup>。革命外交路線佔主導地位，因為這是毛澤東的路線。張聞天，還有周恩來，主張和平外交路線，但是他們必須在行動上執行毛澤東的決定。周恩來只能在毛澤東允許的框架內採取某些靈活措施和展現某種溫和姿態，張聞天也只能提一些往往被置之不理的意見，或者鑽空子，將毛澤東某些短期糾“左”的策略措施擴而大之，推行自己的主張。在前30年中，並不是沒有同各國發展關係，但是除了中間有短短的三四年外，多數時期側重點是在支持世界革命。

張聞天從事外交工作的10年，是中國外交的頭10年，在外交路線兩個30年的分野中屬前30年階段。這個頭10年，照我看來，還可以分為三小段。第一段，從1949年建國到1953年做出朝鮮停戰決策，中國執行的是革命



攝於1954年。張聞天和周恩來交往密切，但是流傳下來的他們兩人的單獨合照很少。

外交路線，它在相當程度上是從革命時期延續下來的傳統思維的產物，而且受到斯大林的影響。第二段，從 1953 年做出朝鮮停戰決策到 1956 年批判蘇共 20 大、特別是 1957 年批判蘇共和平共處總路線，中國執行和平共處政策，這在相當程度上是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共產黨影響的結果。第三段，從 1956 年批判蘇共 20 大、特別是 1957 年批判蘇共和平共處總路線開始，一直到中國外交頭 10 年的末尾，並延續到下兩個 10 年（直到 70 年代初急速轉向聯美抗蘇路線）。中國重新走上革命外交路線，而且愈走愈遠，這是極富中國獨創性、帶有鮮明的毛澤東個人特徵的革命外交路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對外政策的意識形態色彩十分強烈，或者說，以促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為終極目標的意識十分強烈。中國共產黨一向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大軍的一個支隊的身份，將中國革命視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成部分，革命勝利以後如果沒有及時自覺地將自己重新定位為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國家利益的代表者，就必然要自視為已經獲得勝利的革命者和世界革命的生力軍，必然要加緊援助尚未獲得勝利的革命者，認為這是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當時確立了“一邊倒”的方針。這一方針具有發展戰略（採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和道路）和國際戰略兩層含義。就後者而言，就是在當時業已形成的兩大陣營冷戰環境中，“堅決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方面”<sup>〔2〕</sup>，“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sup>〔3〕</sup>。“一邊倒”方針的提出，當然有國家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共產主義者領導的國家，理所當然地要一邊倒向由同屬共產主義者領導的國家組成的陣營。

在“一邊倒”總方針的指導下，中國那一時期在外交上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迅速同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交，並且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蘇聯正式結盟。

實行“另起爐灶”、“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的方針，不急於解決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承認問題。

同“曾經或者仍舊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東南亞等國保持友好關係。但是這一點同支持東南亞國家內部“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傀儡”的武裝鬥爭是矛盾的。下面就要說到。

積極支持被壓迫民族特別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這一方面最能體現中國外交謀求世界革命勝利的終極目標。試舉幾件事。

第一件，在世界革命中同蘇聯做了分工。問題是斯大林提出的。1949年7月，他對當時正在訪問蘇聯的劉少奇說，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國應該有某種分工。斯大林希望中共以後多負擔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民主革命方面的幫助。蘇共主要負責對西方國家革命的指導。斯大林的這項意見，顯然符合毛澤東的心意。在此以前，米高揚1949年2月訪問西柏坡時，毛澤東就已經表示，應當成立像歐洲共產黨情報局那樣的亞洲局。斯大林這次的表態，使中國黨內許多人深受鼓舞。當時我參加工作不久，對此也有真切的感受。我雖然沒有聽到這件事的正式傳達，但是已經聽年長一些的同志口耳相傳。當時我們思想上都是世界革命派，大家都為中國共產黨能夠承擔幫助別國革命這樣的重任而備感自豪。黨內瀰漫的這種革命情緒，正反映了當時中央的指導思想。後來的許多事實表明，中共確實當仁不讓地承擔起了幫助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這一責任，斯大林也堅定支持中國發揮作用。

第二件，公開號召東南亞國家進行武裝鬥爭。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亞洲和澳洲工會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作為大會主席在開幕詞中說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運動的最高任務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武裝鬥爭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的主要鬥爭形式，必須建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軍以及這支軍隊所藉以活動的根據地<sup>[4]</sup>。他指出，不同帝國主義及其傀儡——亞洲各國的政府進行武裝鬥爭，工人階級就會被帝國主義分子及

其傀儡的優勢力量所粉碎。他讚揚當時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緬甸、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的反政府武裝，稱其鬥爭為“民族解放戰爭”，呼籲各國代表給予支持，宣佈中國要擔負援助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亞洲、澳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繁重的責任”<sup>[5]</sup>。在為會議起草的決議中，他首先提出的是同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問題，提出工會的基本任務是建立和鞏固人民解放軍。劉少奇的開幕詞引起世界工聯主席路易·賽揚等人的激烈反對。經過斯大林表態干預，開幕詞得以公開發表。會議決定設立亞洲工會聯絡局，世界工聯執行局承認亞洲聯絡局中的領導作用屬中國。這就意味中國將要承擔領導亞洲國家進行武裝革命的義務。

大約在亞澳工會之後的一個月，亞洲婦女代表會議於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在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的領導人古久里夫人、多列士夫人等人同中國同志之間，又發生了同樣性質的爭論。

中國對於亞洲國家革命鬥爭的支持並不只是停留在口頭上。一些造成亞洲國家疑慮的問題，一直到多年以後才逐步解決。

第三件，支持越南革命。在越南人民反對法國殖民者的鬥爭中，中國除了給予政治上外交上的支持，還在軍事上給予積極的援助，包括提供幾乎全部所需軍用物資，訓練大部分主力部隊，派遣軍事顧問參與越南境內作戰等。中國支持越南革命，有自身安全利益的考慮，但是履行國際義務的因素也是十分明顯的。劉少奇就曾明確地說：“我們在革命勝利以後，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範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sup>[6]</sup>

這一時期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事件，自然是抗美援朝。做出為援助朝鮮而直接同美國作戰的決策，顯然經過多方利害權衡，認為參戰對中國有利，而不利方面有可能得到遏止。這樣決策的目的，研究者有多種分析，如認為是為了

換取斯大林對中國的信任和支持等。但是，中國進行的戰爭畢竟是一場援助社會主義鄰國，抗擊美國的戰爭，或曰世界範圍內的革命者的戰爭。毛澤東多次講到，如果朝鮮革命力量失敗，美國侵略者更加猖獗，對“整個東方”都將不利<sup>[7]</sup>。斯大林更說，“美國同中國的鬥爭必將使整個遠東的亞洲走向革命的道路”，而且會“加強歐洲的社會主義”<sup>[8]</sup>。顯然，抗美援朝不僅是保家衛國，而且是支持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是以戰爭這一最高鬥爭形式支持世界革命。

革命外交的鬥爭矛頭指向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主要是美國。這與國內工作的方向一致：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經濟文化影響，在群眾中開展肅清崇美、恐美、親美思想的教育。

大約從 1953 年 3 月起，革命外交開始發生變化。一方面，支持東南亞國家革命同與這些國家保持正常關係相矛盾，長期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於國內的經濟文化建設也是不小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蘇共政策的變化起了關鍵性影響。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蘇共新領導上台後，立即提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口號，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向中國提議立即停止朝鮮戰爭。斯大林在世時，中國對蘇聯的意見是十分尊重的。斯大林剛剛去世，中國也還同蘇聯保持一致：立即接受了蘇聯意見，改變了原來準備同美國再打若干年的部署，在戰俘問題上不再堅持原有主張，對美方作了妥協，從而排除了停戰談判中的主要障礙，打破僵局，於 1953 年 7 月實現了朝鮮停戰。此後，中國也採取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與和平共處這個“蘇聯提出來的口號”<sup>[9]</sup>，營造和平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為此在外交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同蘇聯一起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勸告越南同意以 17 度為界並退出老撾、柬埔寨，寮國戰鬥部隊、高棉抗戰部隊接受王國政府，於 1954 年 7 月促成印度支那停戰。

1954 年 10 月與蘇共一起提出《聯合意見書》，建議馬來亞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sup>[10]</sup>。

同印度經過和平談判，於 1954 年 4 月簽署協議，解決了兩國之間在中國西藏地區的某些歷史遺留問題。

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同印度、緬甸取得共識，1954 年 6 月將其分別寫入中印、中緬兩國總理聯合聲明中，作為指導兩國關係和一般國家關係的原則。

1955 年 4 月同印度尼西亞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消除或減輕了印度尼西亞和東南亞其他國家對華僑問題的擔心。

積極參加 1955 年 4 月的亞非會議，同已建交和未建交國家的與會代表廣泛接觸，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

同美國於 1955 年 8 月開始舉行大使級談判，討論雙方平民回國以及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希望為和緩與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高一級談判做準備。

此外，中國同英國、荷蘭於 1954 年 6 月和 11 月先後實現了互換代辦，同其他西歐國家的關係有所改善，同日本發展了民間貿易和人員往來，同南斯拉夫於 1955 年 1 月實現了建交。中國支持蘇聯簽訂奧地利國家條約、同日本建交、倡議歐洲集體安全和國際裁軍等緩和國際局勢的措施。

總之，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實行毛澤東所說“和平協商達成協議”<sup>〔11〕</sup>的方針，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爭取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不同於“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的方針，毛澤東說：“現在，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種有利的局勢，需要我們走出去。”<sup>〔12〕</sup>

應該說明，這一段實行和平外交，同毛澤東的一貫思想是不一致的。1958 年 6 月毛澤東自己說，他 1954 年指示在日內瓦會議上和美國人接觸，這與自己一貫的想法不一致。他原來的一貫想法就是要同美國鬥爭，不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sup>〔13〕</sup>。所以，這幾年的和平外交在中國前 30 年執行革命外交路線的全過程中只是一段插曲，一段由於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新領導的影響而違背毛澤東本意的插曲。

由此可知，這一段和平外交持續的時間不可能長久，也確實不久。從 1956 年起，又逐漸回歸革命外交。最初可見的變化是觀念上或指導思想上的。1956 年 2 月，蘇共二十大召開。毛澤東先是在 1956 年一論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為斯大林辯護，再是在 1957 年參加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批判資本主義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最後是從莫斯科回國以後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批判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總路線，完成了在外交路線上批判蘇聯另立旗號的重要轉折。毛澤東認為，蘇聯丟掉了斯大林這把刀子，列寧這把“也丟掉相當多了”，認為蘇聯領導人害怕帝國主義，害怕戰爭，一味追求同美國緩和，不敢鬥爭，不敢支持民族解放運動，不敢支持革命。

針對這種他認為的錯誤傾向，他在不同場合陸續提出了一系列觀點。

1957 年 1 月，毛澤東提出“誰怕誰”的問題，認為“帝國主義怕我們多一點”<sup>[14]</sup>。1957 年 11 月，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認為國際形勢到了新的轉折點，“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佔了壓倒的優勢”。在這次會上，他重提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的觀點，表示不怕帝國主義硬要打仗和扔原子彈，“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不能每天怕戰爭。在 1958 年 6 月同外交部領導同志和駐外大使們的談話中，同年 8 月在北戴河會議上和 9 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他都講到誰怕誰、美國組織的軍事集團是向民族主義進攻、緊張局勢對帝國主義更不利、禁運對我們利益極大、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我們比承認我們更有利、不怕打反侵略戰爭等觀點。他在 1957 年 11 月提出，共產黨的對外關係總路線要講支持世界革命<sup>[15]</sup>。1958 年又提出，要堅持同美國鬥爭，不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sup>[16]</sup>。

關於不急於同帝國主義國家建交、參加聯合國還是“慢一點好”<sup>[17]</sup>，毛澤東在 1956 年 9 月同蘇加諾的談話時就已經提到，那時距離他宣佈“門要關死已經不可能了”才過去兩年。

關於馬來亞共產黨的鬥爭形式，毛澤東 1956 年會見馬共領導人時，讚揚他們在同馬來亞當局談判破裂後表示要繼續戰鬥下去是英雄<sup>〔18〕</sup>，這距離蘇共與中共建議馬共放棄武裝鬥爭的《聯合意見書》的提出也不過兩年。（後來在 1967 年 1 月，毛澤東正式聲明：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這樣大膽，1954 年要馬共轉變鬥爭形式的意見竟沒有請示過他<sup>〔19〕</sup>。）

毛澤東的這些革命外交思想從 1958 年起見諸行動，中國外交明顯加強了鬥爭性。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決議，嚴厲批判《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從此開始了對南共和鐵托的大批判。同月，因為長崎國旗事件和岸信介內閣敵視中國的言行，中國斷絕了同日本的一切經濟文化和人員往來。同年 7 月，因為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問題，毛澤東同專程來華澄清的赫魯曉夫激烈爭論。8 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馬祖，台灣海峽局勢驟然緊張。因為印度支持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1959 年 4 月中國人大通過決議，5 月《人民日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西藏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按照毛澤東的“不怕鬼”精神，同尼赫魯這個所謂“半人半鬼”進行了一場嚴重的鬥爭。隨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中國將先於蘇聯進入共產主義、世界革命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之說極一時之盛，對外鼓吹中國經驗和毛澤東思想開始成為時尚。

毛澤東的上述體現革命外交的觀點和行動，是以蘇共新領導的外交路線作為對立面的。他在申述這些觀點、論證這些行動時常常直率地批評蘇聯（內部講話中指名道姓，公開發表時明顯暗示）。這是這一段的革命外交與第一段（1949 年建國後到 1953 年做出朝鮮停戰決策以前）革命外交的根本不同點。那一段，中國自認為是蘇共（自然是斯大林領導的）統率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方面軍，中國的革命外交從整體戰略到許多具體行動都同蘇共一致，甚至就是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戰略的一部分。毛澤東自謙為斯大林的學生，外交上，特別在戰略層面，絕對注意與斯大林保持一致，決不會別樹一幟。那一段的革命外交，是同斯大林和蘇聯站在一起，實際上是在斯大林領



導之下的革命外交，是中國共產黨延續革命時期的思維和同蘇共關係的產物。斯大林去世以後，在最初一段短時期延續聽命於蘇聯的傳統因而跟著蘇共新領導也搞和平共處以後，特別是認為蘇共在二十大犯了錯誤必須仰賴中國支持以後，毛澤東就重新打起世界革命的旗幟，實行革命外交路線。不過這時的革命就不是跟著蘇聯革命，而是在對蘇聯的批判（批判它不革命甚至背叛革命）中和在同它分庭抗禮中展現的革命，在意識形態語言上和具體外交行動上，都獨樹一幟。所以我們前面說，這一段的外交路線，是極富中國獨創性、帶有鮮明的毛澤東個人特徵的革命外交路線。

這一段的革命外交後來逐步升級，到“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公開宣佈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再後來又驟然改變為“一條線、一大片”的聯美抗蘇外交，到 20 世紀 80 年代才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不過這都是後話，與張聞天已沒有關係，不在本書討論的範圍。

在中國外交頭 10 年曲折發展的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出張聞天的特色。儘管毛澤東和中央的決策他都必須執行，但是對不同傾向的工作，他的態度明顯不同。對於推行和平共處政策，他不僅積極努力，而且有很多創見和發揮；對於製造或加劇對外緊張局勢和國際緊張局勢的決策，他就顯得消極，而且提出不少不同意見。

說實話，當年我無法接受這樣的批判，因為我覺得張聞天是執行毛主席路線的。今天回過頭來再看，撇開“右傾機會主義”的定性，1959 年的批判還真抓住了要害：張聞天在外交上的基本主張確實是同毛澤東對立的。當然，在外交行動上，張聞天必須執行毛澤東的決定，但是在外交思想上，兩人確有根本的不同。<sup>[20]</sup>

這些不同體現在許多具體事情上，後面按大體時間順序將一一談到。這裡嘗試歸納幾個要點，作為提示。

第一，關於中國外交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涉及如何估計戰爭與和平的可能性和如何估計世界革命形勢。

張聞天不認為美國能發動新的世界戰爭，批評那種以為美國統治階級的政策無法改變、戰爭不可避免的看法是“主觀主義的偏向”<sup>〔21〕</sup>，認為“新的世界戰爭有可能避免”<sup>〔22〕</sup>。他說，我們“不僅要爭取持久和平，而且要爭取永久和平”。只要我們努力，“爭取永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張聞天不認為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勢，認為現在已經不是世界革命的時代。即使人們最為矚目的東南亞，他也認為那裡的民族民主革命並不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不存在共產黨奪取政權的形勢。在張聞天的意識裡，革命和戰爭的時代已經過去，儘管他沒有作出明確概括。

毛澤東曾經說過：“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長一點的和平時期。”<sup>〔23〕</sup>但是他始終認為，只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能避免的<sup>〔24〕</sup>。愈到後來，他對戰爭迫在眉睫的估計愈嚴重，說要準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而且“戰爭引起革命”，世界革命形勢已是“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我們現在正處於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sup>〔25〕</sup>。

第二，關於中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和中國外交的任務，涉及是支持世界革命，還是為本國建設服務，與各國和平共處。

張聞天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應該全力進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辦好我們自己的事。“外交戰線上的任務，就是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保證最有利的國際條件，例如爭取和平的環境，發展同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和文化聯繫等”<sup>〔26〕</sup>。因此要爭取同各國長期和平共處。他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對四處推銷中國革命經驗，反對強加於人的革命宣傳，主張對外援助要有節制。總之，他反對輸出革命。“革命與否，如何革命，都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sup>〔27〕</sup>。

毛澤東則認為，外交要服從革命<sup>〔28〕</sup>，共產黨的對外政策總路線要講支持世界革命，要講聲援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運動、支持國際工人運動<sup>〔29〕</sup>。為了推行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中國積極支持一些民族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或左翼政黨進行反對本國政府的鬥爭，早就在資金、培訓骨幹等方面給予支持。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國更支持亞洲一些共產黨以中國為基地公開進行反對本國政府的活動，同它們常駐中國的領導人保持密切聯繫，支持它們在中國境內設立“泰國人民之聲”、“馬來亞革命之聲”等廣播電台從事反對本國政府的宣傳，還為它們反對本國政府的武裝鬥爭提供經濟援助和軍事物資，直至派遣軍事骨幹。對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左翼政黨，中國也提供類似支持。當然，所有這些武裝鬥爭無一例外都以失敗告終，其中許多流為恐怖活動，曾經得到毛澤東全力支持的波爾布特的柬埔寨革命，更造成數百萬人冤死的悲劇。

第三，關於中國外交的總策略，涉及如何看待和處理國際局勢的緊張和緩和，以及如何看待和處理同西方世界的鬥爭和合作。

張聞天認為，緩和穩定的國際環境於我們有利。我們應當“力爭緩和”，“更不會主動地到處製造緊張”<sup>〔30〕</sup>。他不贊成事事處處採取尖銳的鬥爭形式，不主張動輒對外提抗議，注意對外保持願意緩和與合作的形象。他主張，同西方國家即使鬥爭，也要接觸，還要合作。他建議對進入聯合國和同西方國家建交採取積極態度，建議加強翻譯出版西方國際問題著作，建議舉辦國際博覽會以引進設備技術，還將外資經濟規劃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六種經濟成份之一。他說，“每個國家要發展和進步（甚至要生存）都必須同其他國家和人民進行合作”，“完全的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sup>〔31〕</sup>。

毛澤東則認為，“緊張局勢比較對於西方國家不利，對於美國不利”，反而對於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民有利，因為緊張局勢可以動員人民革命<sup>〔32〕</sup>。他認為，同美國鬧成僵局有利<sup>〔33〕</sup>，維持緊張動盪的局勢有利，因此要求不同美國

發展關係，關起門來，自力更生地建設社會主義<sup>[34]</sup>。他對聯合國採取排斥態度，認為晚些同西方國家建交更好。他主張利用“絞索”牽住美國，“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吸引美國的鋒芒過來同美國鬥。後來不僅同美國鬥，同帝國主義鬥，而且對“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也都要鬥，還要多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馬列主義政黨和派別，即所謂“三鬥一多”。世界各地哪怕有一丁點反抗現存秩序的動靜，都會引起中國的歡呼雀躍。當時中國外交的形象可謂“鬥”字當頭，唯我獨革，是強烈排斥和對抗外部世界的。

第四，關於民族主義國家，涉及如何認識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和對民族主義國家應取何種政策。

張聞天認為，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看，不能再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大部分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獨立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獨立後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資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實行民族改良主義與和平中立政策，具有進步性，還有相當的生命力。在相當時期內，這些國家還不存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不能搬用中國革命的經驗，搞共產黨領導的通過武裝鬥爭推翻現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因此，他明確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中的相應結論需要修改。他主張，對民族主義國家要採取有團結有批評，主要是爭取和支持的政策，爭取同它們長期和平共處。

毛澤東承認民族主義國家在兩大陣營中持中間立場，也曾實行同它們保持友好關係的政策。但是他同時認為，這些國家還要進行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並進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後來更把民族主義國家的執政者稱為“反動派”，與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相提並論，通通列為打倒對象，號召和支持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左翼組織進行革命。他曾經執行的同民族主義國家保持友好關係的政策，最終完全服從於向這些國家輸出革命的政策。

第五，關於社會主義國家，涉及是否向別國推銷中國建設路線和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

張聞天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應當平等相待，中國在國際關係中，在同社會主義國家關係中應該保持謙虛態度，中國以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為代表的建設路線是錯誤的，不應該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推銷。他 1958 年就控制對外散發毛澤東著作，強調全世界還沒有哪個國家認為政治思想中心已移到北京，“為首不是自封的”，“我們也不應當、不需要去爭取”〔35〕。他不認同關於蘇聯不敢對美國鬥爭的說法（當時還限於內部議論，後來就發展成公開批評蘇聯不反帝），反覆批評表現在這些問題上的驕傲情緒和大國主義。

毛澤東則認為，蘇聯建設道路不如中國“多快好省”，斯大林的經濟學不談政治掛帥，不講群眾運動，“冷冷清清，悽悽慘慘，陰陰森森”〔36〕，因此要求向蘇聯專家宣傳中國的總路線。他 50 年代中期開始批評蘇聯的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理論，指責蘇聯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想“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37〕，到後來全面指責蘇聯變修。他認為世界革命中心已經轉移到中國，而且泰然接受“當代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導師和最傑出的領袖”和“當代列寧”的稱號。有些人喜歡引用毛澤東 1968 年 5 月 16 日的批示，企圖說明毛澤東不贊成北京已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的提法。其實毛澤東的謙遜僅限於表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38〕，並沒有說這種提法不對或根本不應說。相反，他倒是白紙黑字地肯定了革命中心轉移之說，肯定了給他自己戴上的“當代列寧”的冠冕。1967 年 11 月 7 日兩報一刊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說：“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偉大旗幟的革命新時代。十八世紀末，革命中心在法國，十九世紀中葉轉到了德國，無產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產生了馬克思主義。二十世紀初葉，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隨著，世界的革命中心又逐步轉到了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同志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導師和最傑出的領袖，毛主席就是當代的列寧。”毛澤東 11 月 3 日審閱這篇社論後批示：“內件已閱，修改得好，可用。”〔39〕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上述不同，主要是就 20 世紀 50 年代的情況而言的，因為自 1959 年被逐出政治舞台，張聞天就再也沒有能就中國外交發出過甚麼聲音。在 50 年代，革命外交路線的有些表現還不那麼直白，有些事情還只是剛剛露頭，有些事情因為中國還在同一些國家發展關係而看得不很清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已經拒絕“左”傾路線的最初表現，即使是隱晦的表現。進入 60 年代，這條路線惡性發展，1963 年開始號召進行反對帝修反的鬥爭〔40〕，“文革”開始時更公開喊出要打倒帝修反〔41〕，即打倒除“明燈”阿爾巴尼亞以外的所有國家。世界革命的旗幟已經高高樹起。與此同時，“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這個詞語風靡一時，上上下下人不離口。我們這些外交部的“文革”過來人都會記得，差不多每一次狂熱的集會上都要呼喊“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或“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勝利萬歲”。應該說，“革命外交路線”確實是對毛澤東外交路線的準確概括，不能不承認“革命外交”這一概念提出者（沒有考證是“文革”中的哪位“理論家”或哪一次紅衛兵集會）的智慧。當然，所謂“革命”，指的是世界革命；“革命外交”，指的是世界革命外交。不過，當外交同世界革命糾纏在一起，就不可能有，實際上也已經沒有甚麼外交，只能剩下赤裸裸的世界革命了。

## 註釋

- 〔1〕 有的研究者把這兩條路線稱為極端路線和溫和路線，認為它們較量的結果是極“左”勢力佔上風，外交溫和思想與合作方針受壓抑。見王逸舟、譚秀英主編：《中國外交六十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年，14、12 頁。
- 〔2〕 周恩來：為鞏固和發展人民的勝利而奮鬥，《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35 頁。
- 〔3〕 《共同綱領》，第 7 章，第 54 條。

- [4] 《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35頁。
- [5] 在北京各界慶祝亞洲澳洲工會會議成功大會上的講話，《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145—150頁。
- [6] 1950年3月14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指示。見《劉少奇年譜1889—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245頁。
- [7]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7、103頁。
- [8] 斯大林關於蘇聯退出安理會致駐布拉格蘇聯大使的電報。
- [9] 同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毛澤東文集》，第6卷，334頁。
- [10] 見金津：馬共的革命與終結，《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83頁。沈志華：毛澤東與東方情報局，《同舟共進》，2012年1期，38頁。
- [11]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562頁。
- [12] 《毛澤東文集》，第6卷，334、333頁。
- [13] 毛澤東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外交部正副部長、部分回國大使的談話，轉引自陳毅：在外交部黨組務虛會上的發言，1958年6月17日。見《環球同此涼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267頁。
- [14]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343頁。
- [1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見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152頁。
- [16] 毛澤東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外交部正副部長、部分回國大使的談話，轉引自陳毅：在外交部黨組務虛會上的發言，1958年6月17日。見《環球同此涼熱》，267頁。
- [17] 《毛澤東文集》，第7卷，139頁。
- [18] 見金津：馬共的革命與終結，《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84頁。
- [19] 這番話是毛澤東對馬共中央代表團說的。見金津：馬共的革命與終結，《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84—85頁。
- [20] 首先在外交問題上對張聞天和毛澤東進行比較研究的是何方，見《黨史筆記》。在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中，他提出，兩人在外交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套思想和兩條路線”。
- [21] 《張聞天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993頁。
- [22] 論和平共處，《張聞天文集》，第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225頁。
- [23] 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270頁。
- [24] 見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4頁。
- [25] 毛澤東：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1966年10月25日。
-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張聞天文集》，第4卷，270頁。
- [27] 關於執行我國和平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問題，《張聞天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476頁。

- [28] 見朱良：無私無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炎黃春秋》，2006年第8期，6頁。
- [2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52頁。
- [30] 《張聞天文集》，第4卷，300頁。
- [31] 《張聞天文集》，第4卷，280頁。
- [32] 《毛澤東文集》，第7卷，416、409頁。
- [33] 毛澤東1958年6月16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外交部正副部長、部分回國大使的談話。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851頁。
- [34] 毛澤東1958年6月16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外交部正副部長、部分回國大使的談話，轉引自陳毅：在外交部黨組務虛會上的發言，1958年6月17日。見《環球同此涼熱》，267頁。
- [35] 在布拉格使節會議上的最後發言，《張聞天文集》，第4卷，304頁。
- [36]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國史學會》，43頁。
- [37]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國史學會》，133頁。
- [3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276頁。
- [3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431頁。
- [40] 見諸當年9月18日劉少奇在平壤群眾歡迎大會上的講話（“當前的世界形勢，已經發展到這樣的地步，要反對帝國主義，就常常不能不同時反對為帝國主義服務的現代修正主義”），同年9月30日周恩來在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將帝修反綁在一起說，“不管一小撮帝國主義者、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者和現代教條主義者如何興風作浪”）和10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我國人民一定要堅持不懈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的鬥爭”）。
- [41] 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說：“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全世界革命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來。”



## 一、走上外交岗位



張聞天擔任的第一項外交職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sup>(1)</sup>。這是一項他從未到任履職的職務。他被任命此職，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聯合國關係的走向尚未完全確定，存在著正常發展的可能性的短暫時期，而他始終沒有到任，則是這種關係長期處於對立狀態的結果。

中國同聯合國長期對立的這段歷史，是人們比較熟悉的。在 1971 年以前的 22 年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沒有恢復，“聯合國軍”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兵戎相見，聯合國通過“中國侵略朝鮮”的決議。中國則視聯合國為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或美帝蘇修的爭霸工具，毛澤東擺出蔑視聯合國的姿態，多次表示進聯合國還是慢一點好。他不屑於進聯合國，甚至贊同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的主張，即踢開現有的聯合國，另組一個聯合國。

但是，在 1950 年上半年，準確地說，在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前，中國同聯合國的關係卻是不確定的，存在著另一種發展的可能。

首先是在聯合國起主導作用的美國曾經表現鬆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美國醞釀並最後決定從中國大陸“脫身”，在是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保衛”台灣、如何處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等問題上曾經猶豫觀望，舉棋不定。美國國務院許多人主張在適當時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條件是中國遵守國際義務和善待美國公民。到 1949 年底和 1950 年初，美國確定繼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安理會中取代國民黨，但是不為此使用否決

權，這就是說，如果安理會中多數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國民黨，美國就將接受這一決定。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公開聲明，表示《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申明將台灣歸還中國，美國不擬捲入中國內爭，不擬對台灣提供軍事援助，無意在台灣獲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

接著，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試圖解決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1950年3月8日，他向安理會主席遞交備忘錄，主張如一個革命政府“在其本國領土內行使有效的權力，並慣常為大多數人民所服從”，那麼即使聯合國個別會員國拒絕承認其為合法政府，也應該給予該政府以在聯合國中代表本國的權利。4月、5月間，他到華盛頓、倫敦、巴黎、海牙、日內瓦、莫斯科斡旋，建議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

對於美國發出的信號，蘇聯迅速做出反應。在杜魯門聲明發表後不到兩天，維辛斯基外長即於1月7日凌晨1時<sup>[2]</sup>向當時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提出，要中國要求安理會開除國民黨代表。1月13日，維辛斯基再訪毛澤東，進一步要中國即向安理會派出自己的代表。1月17日，莫洛托夫又催促毛澤東說，此事“應盡可能快些”進行。蘇聯自己則除支持中國要求，還在安理會提出開除國民黨代表的議案，並且聲明在開除之前蘇聯代表將不參加安理會的工作。

毛澤東當時處理與西方國家關係的基本方針是“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這一方針要求在清除帝國主義國家在華特權和影響後再同它們建交，並不急於解決它們承認中國的問題。其基本精神當然也適用於處理同由西方國家主導的聯合國的關係。本來，正像任何新國家和通過革命成立的新政府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首要的外交任務，理應是取得國際承認，包括享有在國際組織中的應有權利，首先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擁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國際上公認的大國標誌，對於在世界事務中發揮影響有重要作用，因此爭取在聯合國和安理

會中的合法地位理應是外交上的大事。但是中國當時所做的，只是以外長周恩來的名義，分別向聯大主席和秘書長發了一份表態性的電報，要求取消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參加聯合國的權利。此外在爭取進入聯合國方面就沒有做過甚麼實際的努力。

不過，當蘇聯表示要中國採取積極行動時，毛澤東還是表示“百分之百地贊成”<sup>(3)</sup>。儘管他對聯合國能起的作用以及中國任命駐安理會代表的意義並不看重，甚至對聯合國能否存在下去也有疑問<sup>(4)</sup>，他還是立即佈置任命中國駐聯合國代表等工作。在此以前，特別是在此以後 22 年的長時期中，毛澤東對聯合國一直持消極態度（對聯合國作用評價消極，對進入聯合國不予重視，對聯合國活動持批判態度）。此時他對進入聯合國表現積極，只是一個短暫的插曲，顯然是蘇聯影響的結果。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了張聞天駐聯合國首席代表一職的任命。



1950年2月13日，張聞天告別遼東。

張聞天被任命後的一個短時期內，中央一些領導人對於在聯合國和安理會中取代國民黨的前景頗為樂觀。劉少奇 2 月 5 日代表中央致電當時尚在遼東的張聞天，電中引用捷克大使的話說，大概三個星期內中國代表即可前往聯合國。中央不僅催促張聞天迅速來京，而且由中央組織部急如星火地下令抽調一大批幹部到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要求在北京的三天內報到，在外地的五天內報到。

但是，時間過去不到五個半月，朝鮮戰爭的炮火就改變了一切。張聞天就此注定成為從未到任的常駐聯合國代表。

中國任命常駐聯合國代表是應對當時局勢的一項步驟，至於讓張聞天擔任這一職務，則毛澤東自有其考慮。

毛澤東最初考慮的人選是章漢夫。1950 年 1 月 13 日和 17 日他先後向維辛斯基和莫洛托夫表示，章漢夫在美國學習過，是最合適的人選，唯一合適的人選。但是最後他還是把張聞天擺到了這一位置。毛澤東向劉少奇宣佈這一決定時說，章漢夫資望方面有不夠之處。

其實，就出任常駐聯合國代表而言，章漢夫的資望足夠了，至少較之其他國家的代表毫不遜色。章漢夫擔任過兩廣臨時省委代書記、江蘇省委書記、上海工委副書記、港粵工委負責人，還擔任過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即以外交經歷而言，他 1945 年曾作為中國代表團秘書到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1949 年擔任過上海外事處處長，還是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其他國家的駐聯合國代表鮮有出其右者。例如當時的蘇聯代表馬立克，可以說沒有甚麼黨政工作經歷（蘇聯 1950 年的《外交辭典》中只用“1935 年以前在烏克蘭從事蘇維埃和經濟工作”一語帶過），在外交領域雖然當過駐

日本大使，最高官職也只是外交部副部長。

至於張聞天的資望，當然更是綽綽有餘。為了突出張聞天的資歷，毛澤東向劉少奇交代，新華社發佈新聞時，須介紹張聞天是中共中央委員，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及各項革命工作。按照這一意見，新華社在1月20日發表周恩來外長就張聞天的任命致電羅慕洛、賴伊新聞的同時發表了《張聞天簡歷》，其中說：張聞天“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和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張聞天於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1年以後，參加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在1934年冬至1935年冬中共中央領導中國人民革命軍隊舉行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張聞天是這一長征的領導組織中的一員。1945年中共第七次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然而無論是毛澤東的交代，還是新華社發表的簡歷，都沒有提到張聞天最重要的資歷——曾在黨和紅軍的危急關頭以及由國內戰爭過渡到抗日戰爭的偉大戰略轉折時期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時期已經開始批評“左”傾中央主要領導人博古的錯誤，在遵義會議上代表反對“左”傾路線的力量作了“反報告”。正因如此，又以其當時身為中央二號人物的影響力，張聞天在會上被指定起草會議決議並當選為中央總書記（在遵義會議以後1935年2月5日的扎西會議上正式接任）。從此他擔負這一重任直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sup>[5]</sup>。在此期間，以張聞天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實現著對全黨的領導，而張聞天個人不僅主持中央歷次會議，代表中央上對共產國際請示報告、下對各地黨組織實行領導，掌管重要幹部的派遣任免，而且在許多關鍵決策問題上發揮了主導作用。

例如，由內戰到抗日的戰略轉變，最早就是由張聞天在1935年10月22日政治局吳起會議上提出的（他認為，阿比西尼亞戰爭展開了二次世界大戰，這將使日本加緊侵略中國，因而“現在保衛蘇區要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後來張浩到達瓦窯堡，傳達了共產國際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精神。



1938年中共六中全會時合影（張聞天那時仍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後排左起：陳雲、秦邦憲、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張聞天即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相關策略，在徵求了時在前線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意見後，召開瓦窯堡會議，在會上作了形勢和策略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他起草的決議，實現了黨的政治路線的根本轉變。

再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形成的大事。事變發生之初張聞天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對策，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數人主張“除蔣”、“審蔣”，“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張聞天則提出“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隨後幾天意見趨於一致，中央執行了張聞天提出的方針。

張聞天主導的重要決策還有很多。例如改變對富農的策略，改變青年運動的工作方向和組織形式，實現白區工作的轉變，等等。

這些歷史事實說明，張聞天是曾居全黨最高領導崗位並且名副其實地實行了對於全黨領導的人物。以常駐聯合國代表所需要的資望，本來無須派出張聞天這樣的重量級人物。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正在準備邁出登上國際舞台的第一步，毛澤東此時決定派出張聞天，也許確有借重其聲望在各國外交老手面前壯聲勢之意。不過僅此而已。毛澤東對聯合國本身就不看重，所以這項安排並不意味著對張聞天委以重任。毛澤東甚至也沒有打算張聞天能夠赴任履職<sup>[6]</sup>，即使張能夠就任，駐外外交官也是授權有限的職務。讓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級人物中的為首者出任駐一個國際組織的代表，不能不令人產生殺雞焉用牛刀，龐統緣何又當縣令之感。

毛澤東對張聞天並不完全放手，也不完全放心。他曾兩次引用“沉默是金”，叮囑張聞天要多請示。一次是1950年3月，毛澤東訪蘇歸來，張聞天接受常駐聯合國代表任命不久。毛澤東說，怎麼搞外交我也不懂，不過最要緊的是少說話，不說話是金子，少說話是銀子。第二次是1951年4月張聞天赴任駐蘇聯大使前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說，據王稼祥介紹，幹外交應該學維辛斯基，少講話，多請示。不講話是金子，少講話是銀子。

所謂“不講話是金子，少講話是銀子”，可能是西諺“雄辯是銀，沉默是金”（英語 speech is silver, silence is golden，俄語 Слово-серебро, молчание-золото）的不準確的翻譯。建國之初蘇聯駐華大使向中國一些即將赴任的大使傳授外交工作經驗，曾講了這句話，傳到後來，變成了“不說話是金子，少說話是銀子，多說話是破銅爛鐵”。據說，周恩來曾批評這種說法稱，外交上說話，究竟是不說話，還是少說話，或者多說話，決定於時間、地點、條件，不能一概而論。不論如何，外交上引用這句話是把它當成外交場合與對手周旋的技巧。至於說由此得出要“少講話、多請示”，這就是一種引申了。



“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這幾乎是告誡中國外交人員不得越權的頭號戒律。毛澤東特意提醒張聞天要少說話多請示，就是要他意識到自己授權有限的地位。

後來，張聞天以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同樣資歷出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如果說建國初期派他代表中國亮相國際舞台，還有借重其資望的考慮，那麼在沒有特殊資望需要時要他出任這兩個職務，就是單純的授權有限了，出現了“政治局委員的虛位和實際職務間的差距”<sup>(7)</sup>。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擔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大使和副部長，不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絕無僅有，而且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也屬特例。當時社會主義國家駐蘇聯大使中，只有保加利亞大使是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那是個老太太，記得叫布拉戈耶娃（Благоева），長期流亡蘇聯，後來留下當大使，不久即死於任內。

更奇怪的是，即使按實際職務需要由張聞天出面參與的事，他也得不到授權。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互派代表團出席彼此的代表大會，團員中必定包括駐對方國家的大使。但是，出席1952年蘇共19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劉少奇，團員有中央委員饒漱石、陳毅、王稼祥，候補中央委員劉長勝，卻沒有政治局委員、駐蘇大使張聞天。後來劉曉擔任駐蘇大使，情況即有不同。1956年，劉曉以中央候補委員和駐蘇大使的身份參加中共出席蘇共二十大的代表團（團長朱德，團員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1959年和1961年他又是出席蘇共二十一和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團的一員（團長都是周恩來，團員分別是劉寧一、劉曉、李雪峰和彭真、陶鑄、康生、劉曉）。

其實，張聞天在外交崗位上處於受貶謫的地位，只是長期以來這種狀況的延續。延安整風以後，張聞天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實際上只負責一個中央材料室。材料室的任務是根據公開報刊材料搞調研，編寫《參考資料》。照鄧力群的說法，就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只管一個只有四五個人的小

單位。”〔8〕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一方面是張聞天主動要求，另一方面是毛澤東和中央迅速批准，張聞天離開中央機關，到了東北，擔任合江省委書記。當時東北共有 11 個省，合江的轄地只相當於現在的一個省轄市。後來管的“地盤”稍大一些，任遼東省省委書記。他以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名列東北局常委，而當時只是中央委員的羅榮桓、李富春卻是東北局副書記。在合江、遼東時期，張聞天獨當一面，成績顯著，土改中抵制“左”的錯誤尤為突出。但是在 1949 年 3 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張聞天卻遭批評，說他不檢討錯誤（不知是何錯誤），還被要求作檢查。其實錯誤是莫須有的，這樣批評不過是為繼續貶謫做鋪墊。1953 年，在駐蘇大使任內，張聞天曾表示希望回國做經濟工作，託陳雲向中央反映。陳雲覆信說，中央不同意，主席對你有看法，說你不謙虛，驕傲，還說不把你的政治局委員拉下來，是不好安排你的工作的。在毛澤東的這種考慮下，張聞天又頂著政治局委員的名份留在駐蘇大使的位置上。後來，周恩來工作實在太忙，建議調他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主持常務。陳毅出任外交部長時，曾有張聞天是否繼續留在外交部之議。周恩來認為張聞天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較認真仔細，主張將他留下〔9〕。

這樣，就有了張聞天的授權有限的十年外交生涯。

那麼，張聞天自己對於轉入外交工作是如何考慮的呢？

張聞天最初的志趣並不在外交。他對原來在東北的地方工作非常留戀。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曾袒露心跡說：“我個人這三年在東北工作，成績不是很大，不過心情卻很愉快。”〔10〕

使他在東北感到心情愉快的，據我看，有兩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他離開了曾使他不快的環境。在中央工作時期，特別在延安整

風開始前後，張聞天有點苦悶。他在延安整風期間所寫《反省筆記》中有一段敘述。

“毛澤東同志對於我的宣教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找陳雲、康生談談，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見到他的好的方面，另一個人甚麼地方不滿意了就甚麼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關於幹部教育的幾個指示，確經中央看過，而且均用中央書記處名義發出的），因此事情不好辦”。毛澤東曾約康生等人一起同張聞天談話。“他嚴厲地批評了我一陣。我聽了雖然不舒服，但我仍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11〕。

延安整風中，張聞天所受批評還遠不止於這些，其中許多並不公正。《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談到，毛澤東在1943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有一些“過激之詞”，“有些批評也很不恰當。但當時不可能表示異議”。“一些同志對洛甫、恩來等同志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第二階段會議有黨內鬥爭過火的偏向”〔12〕。在這種氣氛下，張聞天做了明顯過頭的檢討。離開中央到東北以後，張聞天先後擔任合江和遼東省委書記。正像長期在他身邊工作、對他了解頗深的何方所分析的，“這兩個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較全面，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容易發揮他的聰明才智”〔13〕。張聞天感到心情愉快，這應該是首要因素。

其次，東北的地方工作接近基層，基層群眾生動豐富、變動不居的生活和鬥爭對張聞天有巨大的吸引力。他自己說，1942年至1943年深入陝北晉西北農村進行的調查研究，使他對於負責一個鄉、一個區、一個縣的黨政工作，發生了很大興趣，覺得這些工作是最接近群眾的〔14〕。也許長期蹲上層機關，很少機會接觸基層群眾，張聞天益加覺得基層的生活更真實，更能檢

驗政策的真理性。陝北晉西北的農村調查，就曾使張聞天很快發現公糧負擔太重、減租減息政策執行不夠、政府法令事前考慮不周執行又不力，以及上面來的人絕對包辦村民選舉、村政權應付上級佈置的開會、填表多，解決群眾中的問題少等問題。在東北工作的四年中，張聞天密切聯繫基層，聯繫群眾，深刻了解群眾中的真實情況，根據實際情況執行中央的政策，同時對這種實踐不斷做出理論概括，在土地改革、工商業政策、知識分子政策、文化政策、城市工作、政權建設、黨的建設以及經濟構成的策劃等諸多方面，他的實際工作和理論政策研究都取得很大成績。各方面的反應基本是好的，張聞天自然感到愉快。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張聞天 1950 年 1 月 19 日聽到廣播，隨即又接到中



1948 年 4 月在鶴崗東北電影製片廠同吳印咸（左二）、陳波兒（左三）、劉英（左四）、袁牧之（左五）留影，張聞天站在最左邊。

央來電，讓他到聯合國去。事出突然，他幾經猶豫，還是在1月23日致電劉少奇說：“對於任命我為出席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一事甚感不安，此事責任重大，偶一不慎會影響祖國聲譽，我再三考慮，我無論在學識、經驗、才能及慎重慮事方面，對這一工作實難勝任。不知中央還有重新考慮，在適當時機採取適當形式改變此一任命之可能否，請指示。”

2月1日，劉少奇覆電說：“你的來電中央各同志已閱並已轉告毛主席。中央及毛主席的意見認為你擔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是適宜的，希望你不要辭謝，並請你於二月上旬到北京研究出席聯合國各項有關事宜，準備隨時出國。”最後還叮囑了一句：“你何時能來，望告。”

這樣，張聞天不能再說甚麼了。2月2日他電告中央，表示服從中央決定，待工作交代後即來京。2月16日，他抵京向中央報到。

張聞天並非情願地走上了外交崗位。但是，他還是立即轉移興趣於新的工作，主動積極地在這個崗位上做了盡可能多的事。

## 註釋

---

- [1] “常駐聯合國代表”(“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是這一職務後來通用的名稱。在周恩來外長1950年1月19日通知張聞天這一任命的照會中，這一職務被稱為“出席聯合國會議和參加聯合國工作包括安全理事會的會議及其工作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
- [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19頁。據維辛斯基說，是1月6日。
- [3] 1950年1月6日維辛斯基與毛澤東的會談備忘錄。
- [4] 毛澤東1950年1月13日曾對維辛斯基說，任命駐安理會的代表未必是解決了問題。他還問維辛斯基，美英是希望聯合國存在還是崩潰。見1950年1月13日維辛斯基與毛澤東關於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談話記錄。
- [5] 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張聞天的總書記職務並未卸去，但是他實際上已將工作移交毛澤東，

自己只負責領導中央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總書記職務的正式卸去，是在 1943 年 3 月 20 日。當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完成了張聞天最後離開中央書記處的程序。

- [ 6 ] 毛澤東 1950 年 1 月 13 日對維辛斯基說，在缺少安理會大多數成員國支持我們的情況下，我們所任命的（駐安理會的）代表就不得不呆在北京了。
- [ 7 ] 何方：《黨史筆記》，利文出版社，2005 年，76 頁。
- [ 8 ] 鄧力群談張聞天與劉英同志，《世紀風采》，2000 年第 8 期。
- [ 9 ] 胡喬木：回憶張聞天同志，《胡喬木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386 頁。
- [ 10 ] 《張聞天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年，856 頁。
- [ 11 ] 張聞天：反省筆記。
- [ 12 ]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288、297、298 頁。
- [ 13 ] 何方：《談史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 年，54 頁。
- [ 14 ] 張聞天：反省筆記。